

全球智库半月谈

增长放缓：中等收入陷阱 VS 均值回归

人民币国际化和多极货币体系的崛起

全球银行业：正在解体还是结构性变革？

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金融“小多边主义”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构想

利马气候会议的进展与挑战

本期编译

蔡云飞

杜哲元

郭子睿

刘 洁

刘天培

刘兴坤

唐靖茹

许平祥

杨国梁

杨 原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俄罗斯经济正走向灾难 4

导读：俄罗斯经济正面临自身结构性问题、西方金融制裁以及油价下跌所带来的三重打击。尽管表明上看，俄罗斯当前的外债、国际储备等指标仍处于合理区间，但汇率贬值和流动性等问题将使问题持续恶化。考虑到三大负面冲击的影响，本文预测明年俄罗斯 GDP 将萎缩 4-6%，并且未来很可能出现由经济下滑引发的政治动荡。

增长放缓：中等收入陷阱 VS 均值回归 7

导读：许多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的放缓归咎于“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作者提出新证据表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只是增长恢复到趋势平均水平。认识到均值回归很重要，因为“陷阱”的信念将会导致政府错判当前的挑战。保持持续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和破坏的两条腿，但是仅有其一受政府和经济精英所重视。

欧洲不应为跨国兼并收购感到恐慌 11

导读：本文就跨国兼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当外国投资者收购本国公司时本国福利是否会下降，二是经济问题能否成为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在跨国并购现行方法上的进行合理干预的因素。本文以全面的分析给出了否定结论，并指出欧盟没有必要为成员国留有余地，这种行为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有害。为了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及刺激国外投资，欧盟委员会应该明确成员国获准参照的干预因素。

全球治理

人民币国际化和多极货币体系的崛起 17

导读：美元的稳定贬值对各国央行官方储备金的影响很小，但汇率关系的实际发展确实显示世界货币体系正在改变。中国最近采取的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包括一些与其他央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已经强化了世界经济中的东方趋势。本文研究了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程。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和支付的增长，使其已经超越美元成为亚洲新的参照货币。这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该区域的经济金融融合也推动了 this 进程。这篇论文试图证明人民币成长为一种国际货币能够促成一个多极货币体系，而这能比目前的货币体系更好地平衡和分配各经济力量的责任。

全球银行业：正在解体还是结构性变革？ 24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引发跨境银行贷款的减少。本文使用更新的银行所有权数据库，论证了全球银行业并非在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更确切地说，它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在危机中遭创国家的银行正在减少它们的境外业务，而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银行则正向处女地迈进。

全球长期利率同步的奥秘 30

导读：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长期利率趋势相同，数值也是较低的？本文通过分析市场

竞争与全球经济结构，结合美国利率的长期变化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政策

融资能刺激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吗? 32

导读：本文验证了银行融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文章使用州际分支银行放松管制这一外生变量来避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然后，文章利用中小企业管理局为未达到某一特定规模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一事实来区分哪些企业有融资约束，哪些企业没有融资约束。最终文章证实了融资渠道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具有融资约束的企业。银行管制的放松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生产率的提高。

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金融“小多边主义” 34

导读：作为转向更积极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加快了在“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参与。当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国国内达成一致时，小多边主义能在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外解决问题。本文探讨了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小多边主义外交。虽然中国已经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历史已经超过 15 年，但近期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应急储备安排协议（CRA）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小多边主义举措更多的是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中国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小多边主义计划会暗中破坏传统的多边机构吗？本文认为，中国政府旨在利用金融小多边主义刺激全球金融机构改革，为该地区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同胞提供金融公共产品并直接推动中国的经济政治权益。中国的小多边主义并不是推翻现有的多边机构，西方国家应该了解、适应和鼓励中国的小多边主义开放。

聚焦中国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的特点 37

导读：中澳自贸协定涉及领域广泛，其达成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这是澳大利亚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重大成功，同时确定了澳大利亚在预计达成的 TPP 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而言，这是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但是，与 TPP 所力求实现的贸易自由化程度相比，中澳自贸协定仍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构想 40

导读：2014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演讲，提出建立一个全面的外交政策平台。本文就这次讲话中所提到的中国外交政策构想作了逐一分析，首先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几个关键的外交政策学说进行重申和认可。其次他重申中国未来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并把中共外交政策中的概念与自己的概念（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联系起来。再次，他将经济外交视作总体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最后，他还改变了中美外交态度。

战略观察

利马气候会议的进展与挑战 44

导读：2014 年联合国利马气候大会于 12 月 1 日至 12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此次会

议是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准备会议，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Shane Tomlinson 认为，此次会议制定了达成 2015 年巴黎会议全球性气候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所承诺采取的行动依然缺乏透明性，全球性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然面临挑战。

一场远未结束的战争 46

导读：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历时漫长，尽管这些年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但它们却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美国的安全并不依赖于中亚地带的稳定，而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其军事存在亦无益于稳定的实现。综合诸多因素，作者认为美国应当放弃在阿富汗实施强制性稳定策略。

本期智库介绍 48

俄罗斯经济正走向灾难

Anders Aslund/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俄罗斯经济正面临自身结构性问题、西方金融制裁以及油价下跌所带来的三重打击。尽管表明上看，俄罗斯当前的外债、国际储备等指标仍处于合理区间，但汇率贬值和流动性等问题将使问题持续恶化。考虑到三大负面冲击的影响，本文预测明年俄罗斯 GDP 将萎缩 4-6%，并且未来很可能出现由经济下滑引发的政治动荡。编译如下：

1、三重打击预计使得俄罗斯明年 GDP 萎缩 4-6%

普京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均不利于俄经济增长。此外，自六月份以来，西方国家均已停止了对俄政府以及私人部门的再贷款。由于市场反应通常具有超调性质，因此上述两大冲击所引发的市场影响都可能继续发酵。另外，油价很可能长期维持在每桶 60 美元的价位，而市场看空方所给出的价位已经低至 40 美元/每桶。

这三大不利冲击都可能单独将俄罗斯明年的 GDP 拉低 2-3%，因此总体而言，我个人预计俄明年 GDP 将萎缩 4-6%。这一数字明显高于俄官方（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给出的 GDP 降低 0.8% 的预测。

2、西方国家制裁短期内不会结束

近期不少西方及俄罗斯的金融家都认为美国和欧盟的制裁有望在明年六月份结束，但根据 Gary Hufbauer 和 Jefferey Schott 的实证研究发现，自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普遍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在所有案例中制裁在预期目标达成前就提前结束的仅占 30%。这也意味着，如果俄罗斯依旧拒绝从乌克兰撤兵，西方国家不大可能放松对其制裁。

3、卢布贬值和流动性问题将恶化俄罗斯财政状况

一般认为俄罗斯的外债水平并不算高——仅占到俄 GDP 的 1/3 左右。据摩根斯坦利的分析报告，截至 9 月底，俄外债总量为 6,780 亿美元，而 GDP 规模在汇率贬值前约为 19,000 亿美元。但近期的贬值已经使得俄 GDP 跌去 40%（按美元现价计算），再考虑到 9% 的通胀水平，这意味着当前俄外债水平已经接近 GDP 的 55%，并且这一比例还将随着卢布进一步贬值而上升。

类似的情形还同样发生在俄国际储备上，虽然同样是表面看来情况差强人意（截至 11 月 28 日，官方国际储备约为 4,205 亿美元），但事实上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储备缺乏流动性。首先要扣减的就是 450 亿美元的黄金和 1,720 亿美元的两大主权财富基金（the Reserve Fund and the National Wealth Fund）。这两大基金都是由财政部持有，其资产既不具有流动性也不归俄央行管辖。这样算来，俄罗斯有效国际储备不过 2,030 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据俄罗斯经济发展

部估计，2014年俄罗斯的资本净流出量将达到1250亿美元，此外2015年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债到期。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际储备情况并不如表明上看起来那样乐观。

事实上，俄罗斯“外”债的债权方中有很很大一部分都是境外的俄罗斯机构，但这部分清偿债务资金很少能返回俄境内。在西方国家金融制裁的大背景下，这一可能性还会进一步降低。这种“俄罗斯自制”的危机会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不太可能提供援助。

4、对俄罗斯宏观经济的影响

最近的数据已经反映出贬值-通胀及经济下行的趋势。未来俄央行为应对通胀，势必继续提高利率。同时油价已经跌去40%，这意味着俄出口减少了20%（1,000亿美元），与此对应的投资、消费和GDP也会应声下降。

就金融机构状况来看，尽管从资本状况上来看并不存在严重问题，但卢布贬值以及货币期限错配等问题将使各大银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最终一旦出现银行破产，结局一定是政府买单。

俄经济下行还对各领域的资源分配产生极大影响。1999-2008年十年间，俄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了十倍，但从2009年开始GDP增速一直徘徊在1%左右。直到2010年前，克林姆林宫始终相当重视养老金，但之后其重要性就让位给了军事支出、秘密警察和国家行政开销，相比之下医疗、教育投入情况则更糟糕。

在民生支出上的削减已经引发了上个月在莫斯科医疗、教育界人士的抗议。对此，克林姆林宫的缓兵之计依旧是老办法——在各地区间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总体支出不变。这些做法都在普通民众间引起了巨大不满，俄社会学教授Natalia Zubarevich公开表示了对在莫斯科——这个拥有俄罗斯1/3人口的第一大工业城市，可能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担忧。

尽管如此，对于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普京的态度与1990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如出一辙——熟视无睹。对于后者，500天的改革计划原本可能成为其翻身的契机，但戈尔巴乔夫选择无视，因此十个月后等待他的是黯然离职。这一切正如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所告诉我们的那样，“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迟于所有人预期，但一旦开始，所有事情的发展速度都将超乎所有人预期。”

5、结论

俄罗斯正面临来自国内国际的三重打击，许多指标都不如它们表明上看起来那样正常。普京政权似乎已经步入死胡同，未来可能会有一线生机，但克林姆林宫的内部问题将阻碍这一进程。未来最有可能的结局是金融危机逐渐演化成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政治动荡。如果俄前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 仍然在世，他将有机会亲眼见证自己当年的预言被一一验证——俄正在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本文原题为“The Russian Economy Is Heading toward Disaster”。本文作者 Anders Aslund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增长放缓：中等收入陷阱 VS 均值回归

Lant Pritchett, Lawrence H. Summers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许多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的放缓归咎于“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作者提出新证据表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只是增长恢复到趋势平均水平。认识到均值回归很重要，因为“陷阱”的信念将会导致政府错判当前的挑战。保持持续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和破坏的两条腿，但是仅有其一受政府和经济精英所重视。编译如下：

为了数十亿人生活的水平提高或全球系统的进化，没有什么比保证各国经济在下一代的快速增长来得更为重要。我们认为传统理论在评估未来增长的前景中存在两个重要错误。

首先，预测中主要依赖于外推和假设，而未能纳入变革的因素。因此设定快速增长的国家将继续快速增长，而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家将继续停滞不前。事实上，就经济增长而言，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表明，过去信息的重要性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

其次，传统理论把原因归于“中等收入陷阱”，即认为当一国收入达到某中间阈值时，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样，我们的工作表明，任何类型的趋势最终都会弱化，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率恢复至其均值水平。

体育记者经常提到“二年级退化”的现象——杰出的新秀通常在他们的第二个赛季中表现的不是那么好。同样，《时代》杂志封面的诅咒——公众人物或名人进入封面的时间往往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顶峰。这两种现象都反映了均值回归的统计原理。在有暂时随机波动的任何过程中，将会有有一个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如果高于平均水平，随之而来的将是下降过程。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的框架应用于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时，发现均值回归是一个稳健的定律。我们证实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跨期间弱相关性的论点 (Easterly et al . 1993)，这种相关性通常在 0.2 至 0.3 之间。这与传统的预测理论——成功和失败都具有记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与主流增长理论——从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特征变量如民族文化、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来解释经济表现，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我们认为，基于外推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需要再慎重考虑，由于经济增长中的均值回归定律，中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出现增长显著放缓的风险。

1、哪些应该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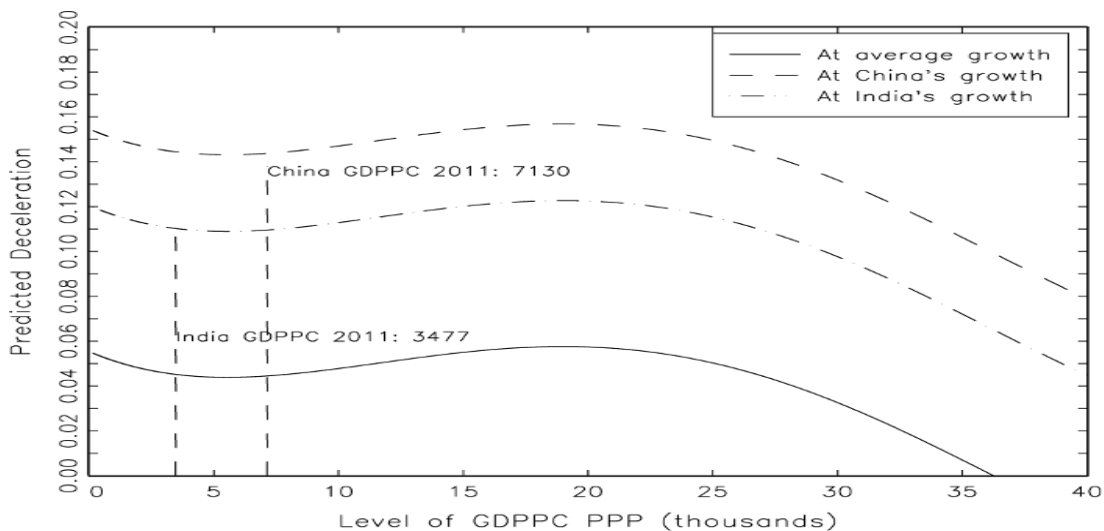
当涉及到如拉美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众多国家时，很难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术语的确切含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快速增长的国家都应该极大地关心其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但是，并不是所有

人都清楚“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什么。“中等收入陷阱”最初只是世界银行为优惠贷款而武断设定的一些阈值，即如果某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不到美国的11%（印尼 10.2%，印度 8.5%，越南 8.0%和埃塞俄比亚 1.8%），则被认为是高风险的。2011年，世界平均的人均 GDP 是 14467 美元，中值是 8491 美元。像墨西哥（12709 美元）、马来西亚（13468 美元）和土耳其（14437 美元），显然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与那些达到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如要进一步取得持续的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印度能以 6% 速度保持 20 年的增长，直到其人均 GDP 达到墨西哥 2011 年的 12709 美元的水平；埃塞俄比亚则可以保持 47 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当放宽人均收入水平条件限制时，很难把增长的均值回归与“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区分开来。

2、收入水平是增长放缓的糟糕指示器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2014)的实证分析发现，增长的加速程度比收入水平能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如图 1 所示，描绘了三种增长水平对应的减速可能趋势线，分别是全部样本 1.84% 的平均增长率、印度 6.3% 和中国 8.6% 的年度增长率。

图 1 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 vs 均值回归



Source: Pritchett and Summers 2014.

首先，我们进行了 F 检验，观察在 0.037 水平条件下收入约束是否具有合并显著性。虽然此检验是显著的，但这完全是由高收入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所引起。如果仅对那些低于 25000 美元（或任何较低的阈值）的国家进行估计，那么收入约束并不显著。

其次，经济增长率关于人均收入的四次幂具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性，特别是，增长减速更可能发生在收入增加到某阈值区域。对一个处于平均增长水平的国家而言，5500 美元的收入水平导致的最小减速风险是 4.3%，但在收入约为 19000 美元时则为 5.7%。随着收入的逐渐增加，如由蒙古、牙买加到匈牙利和巴林，在任何给定的年份将会使得减速风险增加 1.4%。鉴于较低的 F 值，最高和最低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没有显著的差异。

低统计显著性，较小的经验量值，以及不同增长水平的巨大预测差异，都说明收入增长比并不是一个好的增长放缓的指示器。

3、快速增长是未来经济放缓的重要因素

与收入水平的弱影响相比，当前经济的增长率对未来增长减速的可能性则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增长率每多增加 1% 将导致未来减速的风险增加 1.46%，其中，经济增长历史数据的 T 统计为 13.3。如图 1 所示，在目前 8.63% 的增长率水平上，预测中国放缓的可能性是 14.4%。

因此，通过预测增长放缓的相关因素，快速增长的国家具有大幅放缓的风险，但是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均值回归的原因；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则很小，甚至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峰值水平，影响系数值也没发生多大变化。

在某些阈值之前，增长可能存现加速状态，然而一旦达到该值之上，就会呈现减速；但是，在收入水平增长超过 11000 美元时，纯粹的“中等收入”所引发的增速下降要远远小于均值回归效应。此时，滞后期的经济增长系数是 0.83，说明存在很强的均值回归。

4、三个重要的差异性政策思维

首先，仅通过思考“运动员在第二年变的更糟糕了吗”的问题是不可能找到“二年级退化”的原因。答案可能只是因为第一年他们的运气太好。当然，并不能定性地说在第二年成功变得更加困难或他们更容易犯错，而这仅仅是因为事情往往会趋于正常化。正如我们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极其痛苦的获取经验总结，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美好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最需要谨慎的时候。把持续增长的问题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签，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在政策上看似可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很多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放缓，因为这在政治上过于昂贵，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会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一个已知的“陷阱”可以很容易避免，他们也将努力的阻止增长的放缓。但是，维持一个不可持续高增长的代价可能会导致后续的调整要严厉得多。正如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所说，“增长从 8% 到 4% 的路径往往需要一个负 2% 的增长”。

其次，把增长放缓贴上“中等收入陷阱”标签的风险是使得当前挑战引向错误的方向，即过于关注如何处理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发达经济的最后阶段。但是，大多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在 21 世纪却仍有 19 世纪问题等待解决。例如，百分之六十的印度人仍然随地排便，因为城市用水和卫生设施不足。越南在 2010 年的家庭食物支出占收入平均份额还高居 50%，所以农业的核心问题必须提上日程。

第三，决定经济增长的创造性破坏的两个部分仅有一受政府和经济精英所重视。每个人都喜欢“创意”，因为它带来了新投资、新行业和新利润。但持续的经济增长通常依赖于持续的结构转换，表现为新产业的出现和老行业的萎缩（有时只是相对的，但有时是绝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现有企业都不喜欢毁灭的过程，但地理的变迁、就业的转移和企业的退出等都是淘汰不具竞争性行业的重要过程，这也是经济继续持续增长的关键。虽然这经常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但这也是各阶段经济转型的组成部分。所以，可持续增长并不是“中等收入”问题，它是经济发展各个阶段都要面临的问题。

证据表明快速增长并不能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对那些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增长的国家也是如此。增长的持续需要好政策和好运气。这不仅是那些被视为中产收入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现实挑战。

本文原题为“Growth slowdowns: Middle-income trap vs. regression to the mean”。本文作者 Lant Pritchett 为哈佛大学经济发展与实践系教授， Lawrence H. Summers 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和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校长级讲座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 11 号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不应为跨国兼并收购感到恐慌

Mario Mariniello /文 唐靖茹/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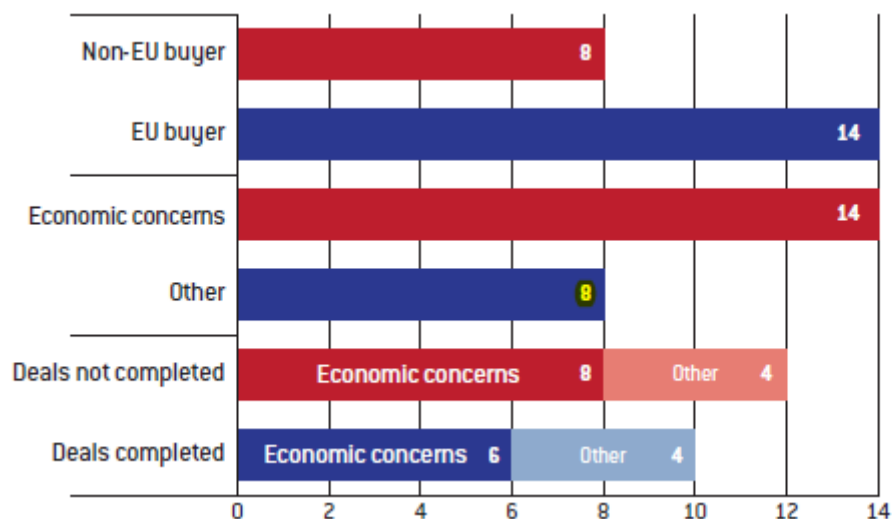
导读：本文就跨国兼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当外国投资者收购本国公司时本国福利是否会下降，二是经济问题能否成为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在跨国并购现行方法上的进行合理干预的因素。本文以全面的分析给出了否定结论，并指出欧盟没有必要为成员国留有余地，这种行为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有害。为了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及刺激国外投资，欧盟委员会应该明确成员国获准参照的干预因素。编译如下：

国家政府经常为跨国并购感到恐慌，或因战略因素，或因经济因素。

外国投资者企图收购本国品牌时，公共常呼吁政府采取干预手段，保护公众利益。但大型跨国收购案（双方或一方为欧盟国）一般由反垄断权威——欧盟委员会审查，国家政府不参与。委员会在评估时只考虑消费者利益，而国家政府则考虑其他利益，这将产生分歧。

特定情况下，当并购影响到公众安全，媒体多元性或谨慎性规定时，国家政府有权在委员会管辖范围内进行干预或施加条件，这多半由经济性假设导致。社会普遍认为国外投资者与东道国关系较浅，更有可能危害经济，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欧盟没有完全限制政府行为，除了以上干预理由，委员会也认可其他“公共利益”的合法性。

表 1 欧盟主要跨国并购案中由于买方国籍发动政府干预的数量（1999-2004）



从表 1 可看出，经济考虑出现在多数并购案中，并且这些并购多数未能实现。虽然这不一定直接导致最终结果，但明显影响了并购进程，并进一步影响潜在经济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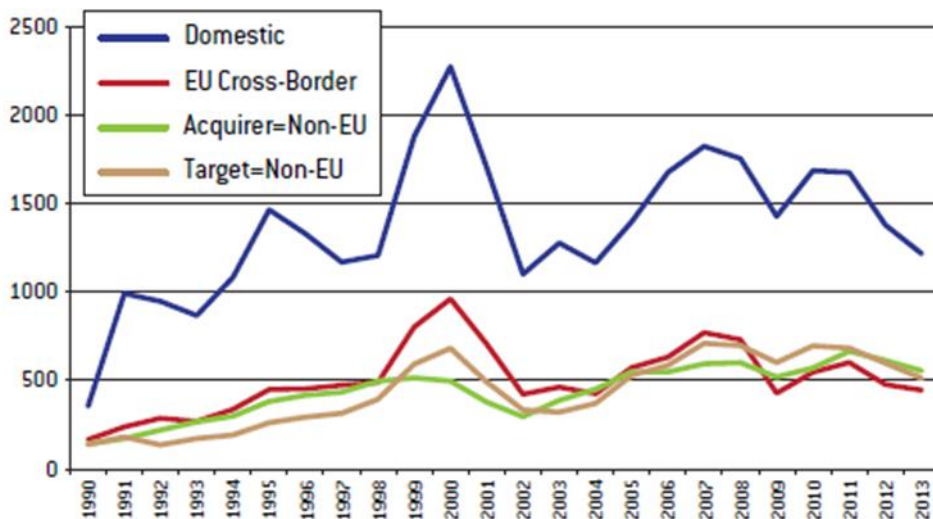
政府对于跨国并购干预的界限并不清晰。什么是“合法公众利益”？政府常干预并购进程，即使不一定符合欧盟法。

本文考虑跨国并购的经济影响、政府干预的潜在成本，以及欧盟的明确规定，给出一些规范欧盟框架的建议。

1、跨国兼并的经济影响

FDI 分为绿地投资（在东道国建立新公司）和 M&A（对已有公司进行投资）两种，发达国家主要靠后者吸引 FDI。由于 FDI 受外国利益影响，一定程度上使东道国丧失了对本国企业的控制。表 2 显示欧盟 28 国涉及支柱产业的兼并案数量在 2000 年达到顶峰，与美国接近。过去 25 年间，欧盟 50% 的并购发生在同国，18% 为欧盟内跨国，其余涉及非欧盟国家。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初起，欧盟内跨国并购数量逐渐少于涉及非欧盟国家并购数量，与以往情况相反。

表 2 欧盟并购案数量（1990-2013）



欧盟国公司与非欧盟国公司的收购及被收购数量基本持平。跨国并购总量增多，交易金额也在增大。平均来看，欧盟内跨国并购比本国并购交易金额多出 71%，而欧盟外跨国并购比本国并购多 41%。外国投资者为欧洲经济周转量做出了突出贡献。2010 年，外资公司贡献了 40% 的总周转量增长。同一市场内不同成员国内外资公司仍然有很高的异质性。

表 3 外资企业周转量对本国企业周转量比率，2011

Country	Turnover ratio
Ireland	123%
Hungary	113%
Slovakia	109%
Estonia	88%
Czech Rep.	84%
Romania	77%
Luxembourg	75%
Belgium	61%
UK	61%
Latvia	58%
Poland	58%
Lithuania	57%
Bulgaria	54%
Austria	53%
Netherlands	53%
Sweden	49%
Croatia	34%
Denmark	33%
Slovenia	32%
Spain	31%
Germany	27%
Portugal	27%
France	25%
Finland	24%
Italy	20%
Cyprus	12%

从以往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生系统性的利益或损害。跨国并购前担忧或热忱均不得其所，中立立场则似乎是最明智的。

“经济影响”定义为对公司表现（以生产平衡量）、就业和研发上的投入，广义而言是跨国并购时经济方面考虑的主要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

- **跨国公司**

跨国企业天生拥有高效率和灵活的雇佣关系。跨国企业通过 FDI 进入外国市场而非贸易，是因为他们的低边际成本能够抵消建立外国子公司并在不知名环境下运营所产生的额外沉没成本，所以外国子公司一般比本国活跃公司更高产。

跨国企业通过移植自己的领先生产技术和管文化至被兼并的子公司，但没有确实证据表明这对东道国经济有积极作用。跨国企业雇佣关系更不稳定，外国企业能对东道国劳动市场应对灵活。但企业间的差异更多由其核心业务导致，而非所属性质。

- **“选择”本国目标**

实证经验表明被国外收购的公司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和创新水平，但近来研究表明高平均生产率是“选择”的结果，而非母公司科技迁移。相比本土收购者，外国收购者倾向收购高生产率的目标国企业，目标企业的初始生产率和外国公司创新能力呈互补关系。跨国企业可通过便捷的融资及规模化生产降低创新成本，所以创新型企业在被跨国公司收购后身价倍增。国外收购者倾向于收购已经具有良好出口网络但近来供应乏力的企业，帮助他们进入从未踏足的市场。

- **被收购公司的后续表现**

抛开选择影响，外资所有权对公司生产、雇佣和创新影响复杂。近来对欧洲国家的研究集中在：

(1) **生产**。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投资综合指标增长较少，除非外国收购者和目标企业生产率相差悬殊。非欧盟收购者并购法国生产性企业后生产率显著提高。

(2) **就业**。芬兰外资企业工人在被收购后工资提高，跨国及本土并购倾向去于对生产岗位裁员。对瑞典企业研究表明外国收购者对保留工厂和就业提高均无积极影响。

(3) **研发**。跨国并购对创新有正向持续影响，尤其是母公司提供出口市场时。德国市场数据表明目前企业研发支出下降同时收购者本国研发提高，这可能由研发行为转移到总部导致。

总之，无法证明跨国并购的以上行为会损害东道国经济，即使是本国内并购也会有相同情况。研究认为收购者对劳动规范的严苛要求导致欧洲出现兼并案负面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情况，而美国没有。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更多地跟公司技术水平相关，如果双方技术相互替代则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如果技术互补则将带来正面影响。因此，预测并购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所属者国籍以外的因素。

2、成员国干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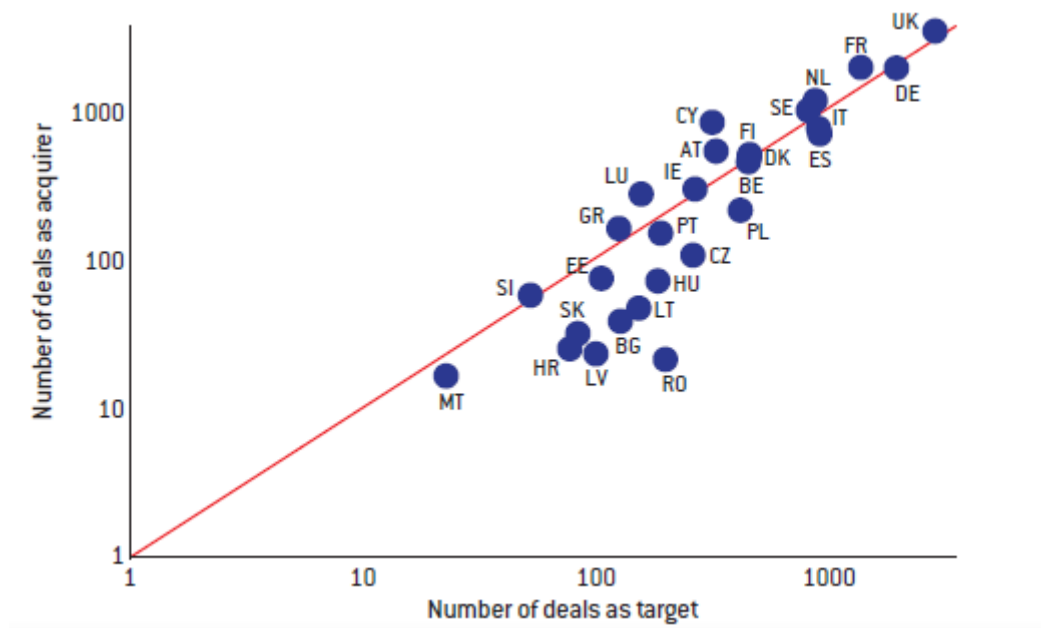
虽然依据情况不同结果不一，但没有证据表明跨国并购的危险性，当委员会进行裁决后成员国不应有争辩余地。这种干预在其他收益方面有明确代价。

委员会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明确反垄断的经济原则：持续竞争是最大化经济福利的最佳方式。正当竞争刺激改进生产，对创新有积极影响。没有保护措施公平竞争能培育健康的国内市场。竞争使经营者不进则退，能淘汰落后企业，适者生存。

只要反垄断权威没有错误排斥并购，竞争不会减弱，并购因而能创造价值。反垄断控制使胜者所得多于败者所失。然而政府干预越多，战略贸易影响越大，失利方报复性限制措施越多。

表 4 显示一国在跨国并购中作为买方的次数和作为收购目标的次数呈正相关。虽然研究表明并购后外国公司将研发活动迁移至母国，但潜在目标国家的报复行为也会阻碍被收购公司研发成果内部流动。长此以往，所有国家都对并购抱有戒心，研发成果也会更少。这种“保护主义的螺旋式升降”会逐渐破坏统一市场。

表 4 跨国并购次数（对数标尺），1990-2014



再者，政府由于利益既得者感情用事容易做出错误决定，自相矛盾的并购规则更有可能违背国家利益。即使是独立仲裁者也有可能存有国家偏见，例如美国法庭对外国公司比对本国公司更容易做出违规裁定，限制公众干预就更难。虽然保护公共利益的动机是好的，但很容易演变成国家干涉主义。

最后是不确定性。成员国越多干涉或施加条件，外国投资者越难预测并购计划，这可能给欧洲带来多重影响，降低投资吸引力。因此，越是想促进生产，增加就业和创新，精细的并购审查越会带来反作用。美国公司投向外国子公司的资金流在东道国选举期间降低了 12%，对未来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减少了投资，潜在的商业限制使就业更困难。

3、需建立更明确的制度框架

如上文所述，一些因素可作为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其他的需由委员会审查其合法性，但并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评断。目前委员会审查公共利益的标准没有公

开，制度交叉冲突形势严峻。政府可以扩大“战略部门”的定义来实施干预，但委员会仅能干涉针对个案的决定，而不能干涉通用条款。政府只要增加欧盟法未规定的条款皆可，企业为了省去司法程序通常愿意谈判，并且司法程序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委员会应该更有前瞻性地限制跨国并购中有潜在危害性的政府行为，起草发布评估案件的指导方针，明确认定标准，清晰定义可干涉理由，并指出经济因素不能成为合法理由。应该公开指导方针起草程序，相关利益者可参与以确保潜在国家战略被有效保护。指导方针应该有双重目标：确保政府参与处理过程并覆盖欧盟一贯方针，为外国投资者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社会福利。

本文原题为“Foreign takeovers need clarity from Europe”。本文作者 Mario Mariniello 为 Bruegel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国际化和多极货币体系的崛起

Miriam Campanella /文 蔡云飞/编译

导读：美元的稳定贬值对各国央行官方储备金的影响很小，但汇率关系的实际发展确实显示世界货币体系正在改变。中国最近采取的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包括一些与其他央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已经强化了世界经济中的东方趋势。本文研究了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程。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和支付的增长，使其已经超越美元成为亚洲新的参照货币。这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该区域的经济金融融合也推动了 this 进程。这篇论文试图证明人民币成长为一种国际货币能够促成一个多极货币体系，而这能比目前的货币体系更好地平衡和分配各经济力量的责任。编译如下：

1、引言

美元的稳定贬值和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各国央行官方储备金中的通货比例影响有限。不过，由欧元和美元组成的双寡头局面正在结束，而主要的挑战者正是中国的人民币（RMB）。最近中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与一些外国央行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并鼓励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同时促进人民币的主要离岸市场在香港的发展。外界猜测中国已准备好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人民币可能一开始是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而最后会成为一种储备货币。

人民币的快速国际化使中国面临着一些风险。人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远非完善，Eswar Prasad 和 Lei Ye (2012)暗示更广泛的政策改革——尤其是涉及到金融市场发展、汇率浮动和资本帐户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很难达到），否则人民币无法进一步国际化。

但中国从某些方面已经对于它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作出了应对。通过研究人民币交易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当局的目标非常保守。更进一步，通过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当局确实已对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做出应对。此外，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融资崩溃，使中国当局对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本质上的不稳定性有所警惕。中国央行的应对是强化同其他国家央行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定，并推广到亚洲以外地区（周小川，2009）。同时，人民币的全球崛起也暗含折衷因素，由于中国经济仍然依赖于出口，短期内对汇率完全放手仍然有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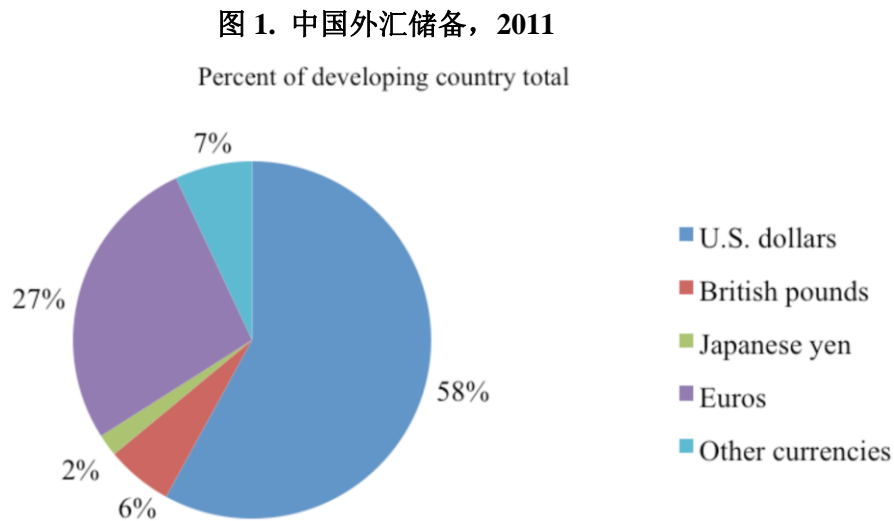
不过，人民币更大范围的使用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外汇市场对货币储备多样化抱有兴趣，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极大关注。本文致力于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和实质。首先我们简要地分析了中国面对正在走弱的第一道防线（第2章），然后陈述了中国在推广人民币在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使用方面的努力（第3、4章）。最后我们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提出一些看法，尤其是结合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来探讨。

2、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崛起涉及到国内国际经济和政治。有时政治所占的比重更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牵涉到中国三个强大的金融经济部门：中国人民银行（PBoC）、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商务部。显然，中国人民银行占主导地位。

在 2008 年危机的警示下，中国央行采取直接行动，通过储备金的多样化以及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保护了中国的外汇储备。2010 年，央行下属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改变了其投资策略。从那以后，中国对美国长期国库券的整体购买量持续降低。新政策创造了投资美国证券以外的投资方式，并且停止了北京到华盛顿的廉价资本流动。

参考中国外汇储备数据，我们看到美元储备占比显著降低。



Sources: IMF COEFER database; authors' calculations

Notes: Data have been adjusted to a constant dollar exchange rate. 2011 is a preliminary calculation.

美元计价资产的一个替代品是欧元计价债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是多样化的第二种渠道，这是一家为管理部分中国外汇储备而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在 2012 年创造了 10.65% 的海外投资收益。外汇分配的第三个渠道是外汇管理局，作为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外管局参与了国企的海外非金融投资项目。这个做法提升了中国境外直接投资。

3、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的货币国际化之路始于 1993 年，而后经历了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政府致力于在二十世纪末实现货币完全可兑换。然而，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放弃了实现全部可兑换的目标。

作为替代，中国人民银行在 2008 年末和 2009 年初致力于与六个国家签订了本币互换协定，总额达 6500 亿人民币。此后也与其他国家陆续签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货币互换是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问题以更有效地处理危机，同时也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发展双边本币互换协定 (bilateral swap agreements, BSAs)，中国央行已能够控制中国和其贸易伙伴对美元结算和计价的依赖性。

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也可能帮助试图融资来进行国际投资的中国公司，为它们消除汇率风险。Liao 和 McDowell (2013) 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背后的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动机。对贸易和直接投资更多的依赖，以及对流动性的担忧，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提供 BSA 以带来流动性。同时 BSA 为贸易伙伴的央行提供了人民币，很好地提振了人们对人民币将作为一种央行储备的信心。

表 1. 双边互换安排：中国和其他“东盟十加三”国家（截至 2007 年 7 月）

BSA	One/Two-way	Currency	Total size, USD bn	Status
China-Thailand	One	USD/THB	2	Concluded: Dec 2001
				Expired: Dec 2004
China-Japan	Two	CNY/JPY	6	Concluded: Mar 2002
		JPY/CNY		
China-Korea	Two	RMB/KRW	8	Concluded: Jun 2002
		KRW/CNY		
China-Malaysia	One	USD/MYR	1.5	Concluded: Oct 2002
China-Philippines	One	CNY/PHP	2	Concluded: Aug 2003
				Amended: Apr 2007
China-Indonesia	One	USD/IDR	4	Concluded: Dec 2003
				Amended: Oct 2006

Source: Bank of Japan and Gao, Yongding (2011)

表 2. 自雷曼兄弟破产以来中国签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定

Country	Date	Amount
South Korea	12 December 2008	RMB 180 bn
Hong Kong	20 January 2009	RMB 200 bn
Malaysia	8 February 2009	RMB 80 bn
Belarus	11 March 2009	RMB 20 bn
Indonesia	23 March 2009	RMB 100 bn
Argentina	29 March 2009	RMB 70 bn
Iceland	9 June 2010	RMB 3.5 bn
Singapore	23 July 2010	RMB 150 bn

Source: Bank of Japan and Gao, Yongding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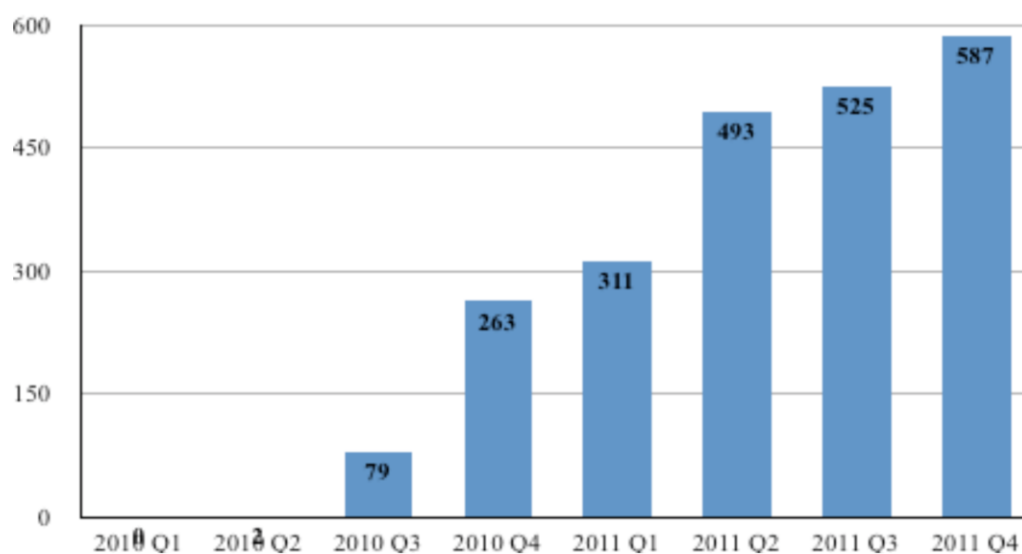
在香港通过银行和公司发行人民币标值的债券、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三个渠道。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中国人民银行试探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态度的一个举动。在 2009 年 7 月，中国试点了一个人民币贸易结算项目。目前对（主要是中国 2009 年和 2010 年的过度刺激性的信贷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担忧使得项目进展停滞。中国正在着力于通过一些自由化措施鼓励进口商进行人民币支付。

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并非毫无风险。Cheung, Ma 和 McCauley (2011) 强调了中国在完全实现国内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前进行人民币国际化有极大风险。中国仍然处于金融发展的转型阶段，净利率依然受到管制，贷款仍受到量化控制，并且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很小。另一方面，建立离岸市场对于克服人民币的有限可兑换以及拓展其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使用非常重要。在实施资本控制的条件下，对入境资金的限制使得当局可以对信贷增长和分配有直接控制(McCauley, 2011)。根据 Subacchi 和 Han(2012)的说法，中国当局相信“只要离岸人民币回到境内市场的渠道受限，就能保证境内金融稳定。”

自 2009 年设立伊始，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项目在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地位方面已经做得比较成功；而离岸人民币（CNH）市场已迅速发展，拓展了一系列金融产品。然而，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增长近来已经放缓，而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经减少；人民币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策驱动的过程；利用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已引起美国的关注和警惕。另一方面，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地理覆盖越来越广。

离岸人民币增长的流动性也使得 CNH（中国香港）离岸市场飞速发展起来。

图 2.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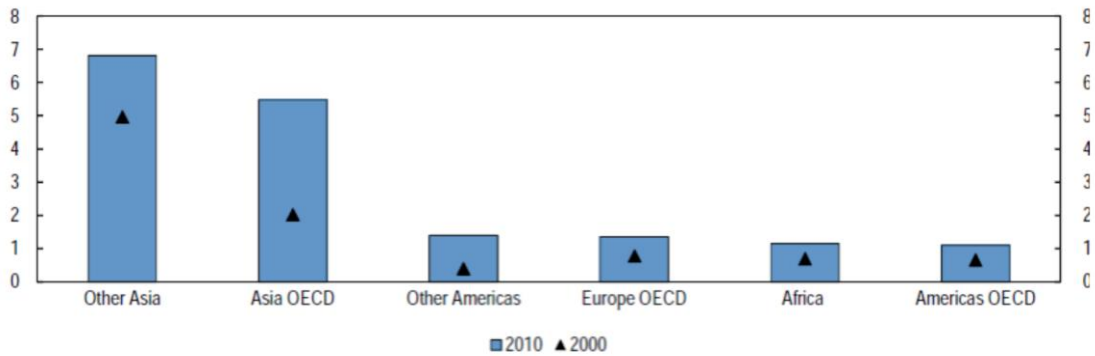


Source: Zhang (2012)

4、人民币——亚洲新的锚货币

人民币崛起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因素。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在亚洲的贸易、投资和援助迅速扩张：中国对该地区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已成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图 3. 中国从一些地区的进口占该国 GDP 的百分比



Source: OECD 2013

人民币的使用正在增长，这毫不令人惊讶。根据最近的研究（Subramanian, 2011; Subramanian 和 Kessler, 2012; Mehl 和 Fratzscher, 2012），人民币在贸易中的使用使得人民币成为了一种储备货币。在很短的时间内，人民币超越美元成为了东亚地区的汇率锚货币。Mehl 和 Fratzscher（2011）的研究强化了一个观点，那就是相对于让通货钉住美元，亚洲的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区域货币的发展。特别的，自从中国政府开始逐渐增加汇率浮动性以来，他们就追随着人民币的变化和中国的货币立场。研究者也找到证据证明了亚洲区域汇率和人民币的联系是双向的。

在一份相似的笔记中，Subramanian（2011）指出，国际货币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不仅和经济体量有关，还和经济体的贸易体量以及外部金融力量有关。而这些因素都正在明显地利好中国。Subramanian 提到，“如果中国愿意对金融市场进行必要的改革并通过资本账户自由化给境外投资者更大空间，人民币崛起为国际通货将指日可待，也许未来 10 到 15 年就能实现。”

一国货币成长为汇率参照锚货币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它是否能成为其他地区的参照货币。当这种情况发生，在参照货币周围很容易产生一个货币集团，而参照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将占主导地位。欧洲就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

成为一种汇率参照通货对于实现货币主导地位至关重要。Subramanian 和 Kessler（2012）通过考量所有贸易，看到了“一个以贸易为驱动力的超越亚洲的全球人民币集团的潜力”。这个发展的初期标志是更早之前人们发现的一些事实，

那就是人民币在智利、印度和以色列(更不用说马其顿)已经是主要的参照货币,在南非和土耳其是第二重要的参照货币。”

参照货币的地位可能象征着人民币将成为一种国际货币或者将稳定地发展为一种锚货币。目前美元和欧元的地位仍高于人民币,然而,很显然实际变化正在朝着利好人民币的方向发展。

但这个进展并没有完全得到承认。IMF 正将更多国家的货币列入储备货币的行列(比如澳元和加元),但人民币不在其中。正如 David Marsh (2012)所说,这反映了人民币地位不够高,而且其在官方投资组合中占比不高。但 David Marsh 指出,人民币成为亚洲新的锚货币的背后,是中国和亚洲地区更紧密的贸易金融融合。而中国和所有主要央行间都开始进行双边本币互换交易,人民币已经不再束缚于亚洲地区。

尽管这些发展并不是说人民币就可以加入“储备货币俱乐部”了,但仍暗示了一定的趋势。首先,由于人民币正在形成一个事实上非正式的货币集团,关键的结构变化很可能发生。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刺激了全球资本市场和亚洲的金融活动,也降低了亚洲对美元计价市场的依赖。其带来的稳定效应将使与中国贸易联系最密切的经济体将受益最多。人民币增强的锚定作用会改变全球资本市场机制。这会使得亚洲新兴国家退出对美元的追随,这将吸引很大一部分外国资产在该区域的增长。

接下来问题是:我们会走向一个人民币作为稳定剂的全球汇率制度吗?人民币将挑战美元霸权,还是仅仅只作为一种区域性货币?我们会面对一个多极货币集团吗?最后,一个新的多极货币体系会比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更加稳定吗?

Gao 和 Yu (2011)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答案。中国领导层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抉择:美元路径还是德国的欧元路径。中国可能将追求使人民币成为类似于美元、欧元(也可能包括日元)的国际货币。或者选择实现货币区域化,用一种货币取代所有国家的货币。Gao 和 Yu (2011)提到,“如果中国要走这条道路,它应参与进一个成熟的亚洲货币联盟,并且最终,人民币将消失并由一种新的亚洲货币取代。”

5、结束语

中国已采取不寻常的措施促成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崛起。在金融危机中得到巩固的“其他地区的崛起”和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变化可能会促成这个过程。即便中国当局不实施市场驱动的改革,人民币的上升之势也不会停滞(Gallagher, 2013)。中国当局某种程度上的的确确是在争取时间,规避在金融和货币自由化缺失的情况下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并且避免和美元的正面对决。

本文认为人民币正在获得实质性的国际影响力并且它在亚洲已成为重要的锚货币。这个进程以某种方式进行（正如世界银行 2009 年度报告和 Brake 与 Bunda 2012 年所揭示的）：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其他依赖中国贸易的货币已经向人民币靠得更紧。正如美元和欧元一样，人民币将强化其锚定效应并在亚洲形成一个区域货币集团。因此，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三极或者多极货币体系的出现。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每种货币在金融深度、保值和供应上拥有相同的地位。它的价值更可能是拥有不同禀赋的货币之间的平衡，而这会降低美元中心制的内生不稳定性以及货币集团保护主义的风险。妥善管理的投资组合，尤其是央行方面，很可能将风险分散于禀赋不同的货币之间。

美元的新对手的到来是受欢迎的。一个更广的多货币体系会给市场提供更多选择，这使得世界储备金发行者更难以进行独裁和单边行动。美元的“过度特权”——一种实质上的垄断——使得美国能够肆意操作其收支平衡表、对系统性不稳定不负责任而对外疯狂“借钱”。用更广全球货币组合的支持者 C. Fred Bergsten (2011)的话来说，对美国来说“来自海外的压力对于推动必要调整有建设性的作用”。理想的情况是，新的货币体系会控制美国的货币“独立性”，为体系带来更多稳定性。

但那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混乱局面可能出现，可能每个国际货币发行者都只专注于本国利益。在全球协作缺乏的情况下，新的多极货币体系也许只不过会放大目前货币体系的缺陷而已。

本文原题为“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the Rise of a Multipolar Currency System”。本文作者 Miriam Campanella 为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资深成员。本文于发表于 ECIPE 工作稿（WORKING PAPER）2014 年一号刊。[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银行业：正在解体还是结构性变革？

Stijn Claessens 和 Neeltje van Horen /文 蔡云飞/编译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引发跨境银行贷款的减少。本文使用更新的银行所有权数据库，论证了全球银行业并非在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更确切地说，它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在危机中遭创国家的银行正在减少它们的境外业务，而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银行则正向处女地迈进。编译如下：

1、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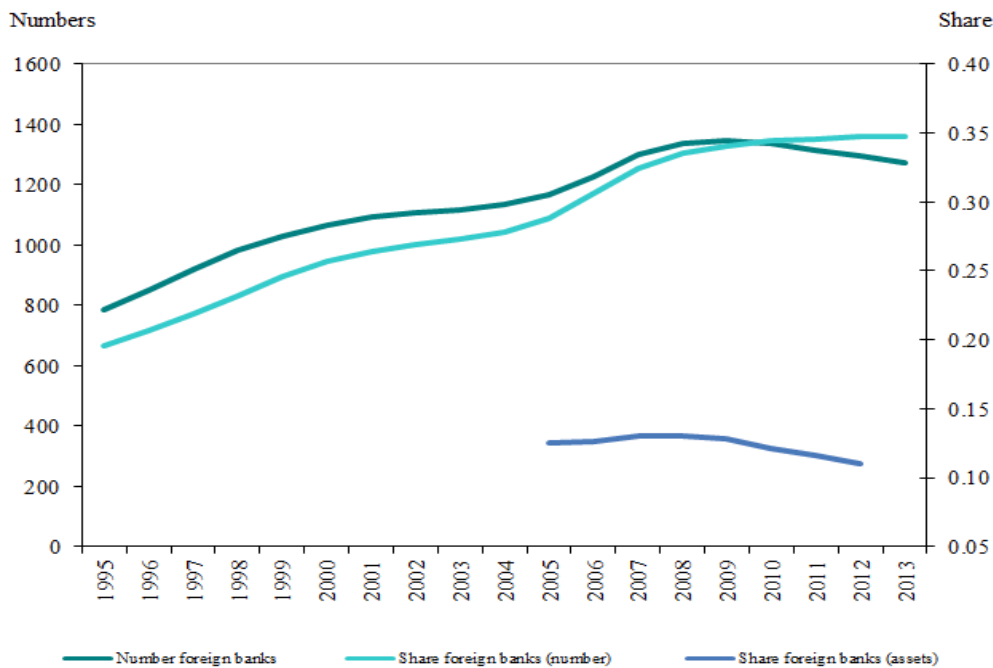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警示后，许多评论员提到全球金融融合进程已经开始进入倒退阶段（比如 *The Economist* 2013, *Financial Times* 2014）。辩论主要聚焦于跨境银行资金流动额的暴跌（比如 Milesi-Ferretti 和 Tille, 2011; Reinhardt 和 Riddiough, 2014）、（大型）欧洲和美国银行的举动以及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分裂（比如 ECB 2014, Beck 2012, Beck 2014）。诚然，美国和欧洲银行是在危机前就已推进金融融合的主要阵地，也受危机影响最大。然而仅仅关注这些地区，已经不再能够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全球银行业的形势了。

这其中一部分是对于实际事实的困惑。尽管跨境银行贷款和其他资本流动数额的暴跌在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数据库中得到清楚记录，但外资银行的发展却不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努力通过更新和扩展全球外资银行发展的数据来弥补这个缺憾（参见 Claessens and Van Horen, 2014b）。这个新的数据库囊括了 1995-2013 年间的 138 个国家中超过 5498 家活跃的银行，其中包括银行所有权及其变动的信息。因此这个数据库非常适合用于研究金融危机是怎样在境外实体业务方面影响了全球银行业。

2、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情形是怎样的？

在危机前，许多银行进行海外扩张，这使得外资银行的数目从 1995 年的 784 家增加到 2007 年的 1301 家（见图 1）。在此期间技术变化、监管减少和危机的发生导致了内资银行业的合并，内资银行的数目减少，使得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大大上升，从 1995 年的 19% 增长到了 2007 年的 32%。到 2007 年，外资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3% 左右。

图 1. 2008 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增长趋于平稳



然而，在东道国和本国之间存在许多不同。在危机之前，外资银行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增长比在其他国家的增长要疲弱得多，2007 年其增长数量和资产份额分别是 23% 和 12%；相对应的，在新兴市场的数字分别是 35% 和 16%，发展中国家是 43% 和 24%。外资银行在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东欧、中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尤其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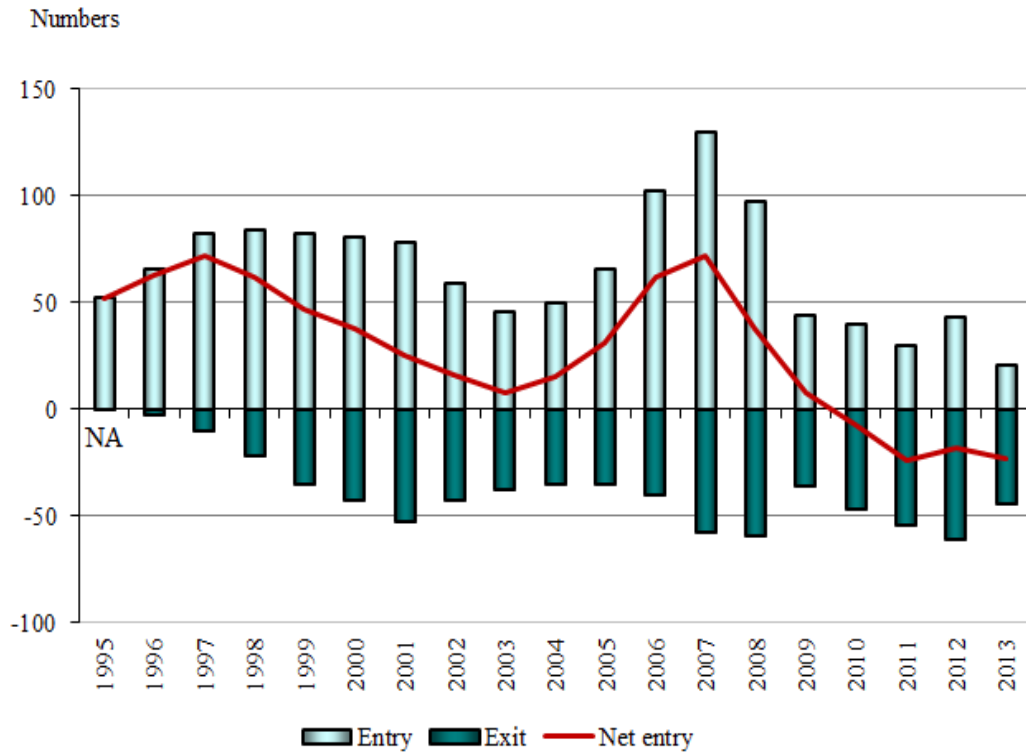
尽管在 2007 年，来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母银行拥有所有外资银行 67% 的所有权，并且控制着其 94% 的资产；但是，它们并非是唯一在进行国际扩张的银行。有数量众多并仍在增长的外资银行来自于新兴市场（259 家）和发展中国家（93 家），这些银行的总部位于东欧和中亚（85 家）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9 家）。然而，尽管为数众多，这些银行通常体量比较小，它们在 2007 年只拥有所有外资银行资产的 4%（参见 Claessens and van Horen 2012）。

3、危机之后的情形如何？

自危机以来，外资银行所有权的状况就一直在变化，这并不令人意外。与危机前一年的高峰期相比，危机之后一年市场的外资银行数量降低至五分之一左右（图 2）。由于退出市场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化，市场进入整体净增长变成了负值。由于内资银行数量也在缩减，外资银行占全行业总量的比例在 2013 年底仍然保持在 35% 左右。然而，内资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比外资银行更大，这一部分是因为许多母银行感到资产负债表状况不佳，使得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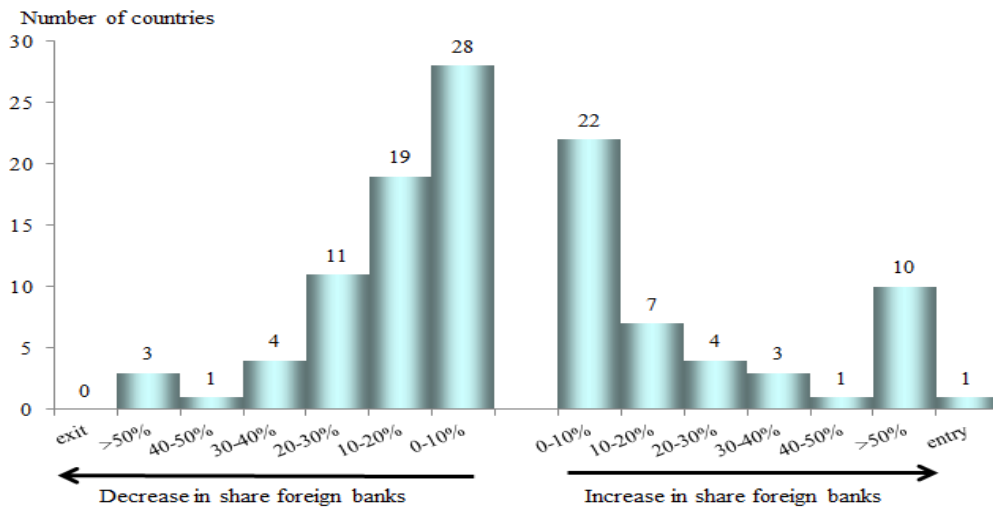
不过，到 2012 年底，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仍达 11%，仅略低于 2007 年 13% 的峰值。

图 2. 外资银行新增量降低，而减少量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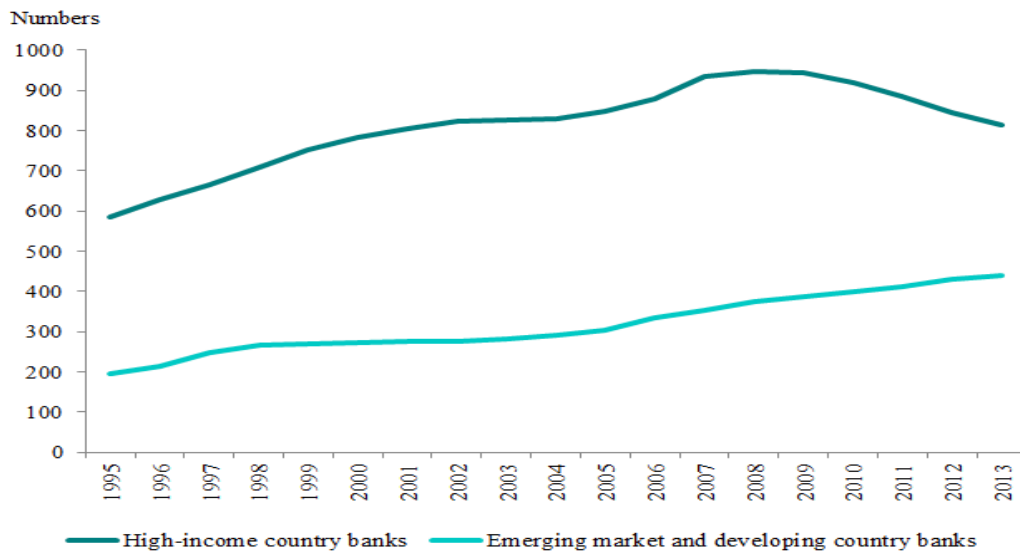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整体发展趋势，掩盖了一些重要差异，而这些差异反映了全球经济金融实力中心的转移。尽管外资银行的数量在 66 个东道国家中减少了，但在 48 个国家却在上升（图 3）。而且尽管外资银行的数量在减少，但由于许多银行不过是被卖给了其他的外国银行，大部分业务并没有显著减少。在经历了 2008 年之前的持续增长之后，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银行的数量已经开始减少，从 2008 年的 948 家减少到了 2013 年的 814 家，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欧洲银行受到危机影响而实行了精简措施。

图 3. 尽管外资银行数量在许多市场减少了，在一些其他市场却有所增长



另一方面，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维持着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速度，并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份额（图 4）。目前这些银行拥有 441 家外资银行，持有全球外资银行资产的 8%，这个占比是 2007 年的两倍。由于这些银行倾向于主要在它们所在的地理区域附近寻找投资机会，全球银行业目前不仅拥有一群更加多样化的逐鹿者，同时也变得更加地区化，“非跨地区银行”这种类型的份额目前已经增长了约 5 个百分点。

图 4. 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趋势



通过研究这些变化背后的决定因素可以发现，那些在本土遭受系统性危机打击的国家在境外的力量被削弱了，而在成长较缓慢的境外东道国家中，当地外资银行资产增长也较缓。在境内境外因素同时叠加导致距离跨度大而投资规模相对

小的情况下，银行业务减少的也会更多；同时那些金融危机前在某个特定国家有相对大规模外资银行业务的母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也更慢。相反地，在经济增长较快并且离本国较近的东道国，外资银行增长则更快。这些变化中大致都与这个事实有关：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银行正在越来越重要。

将外资银行本地贷款和直接跨境贷款两者的发展作比较会发现，危机当中本地贷款比跨境贷款减少程度要弱，这说明外资银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稳定。同时，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新进入市场的银行，拥有相对更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并且信贷扩张意愿更强，它们在许多市场中都起到了缓和本地借贷收缩的作用。而尽管跨境贷款和外资银行本地业务的减少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总的来说，两者的减少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4、政策影响

由于危机已经使得外资银行投资活动当中某些结构性转变加速，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随之而来。

- 首先，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境外业务中（前文所述）并且非常可能（尽管现有数据并不能够证明）在跨境贷款中已经越来越有影响力，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说明它们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中已是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同时，来自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关于金融改革的国际审议中成为积极参与者已势在必行，这是为了保证改革路径能适合于它们的情况。这些国家也将会需要扮演监管监督者的角色，去合理地监管外资分支和本地子公司，这包括确保这些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并且资质不良银行能够迅速得到重组和分解。另外，为了使不同类型外资银行的投资的金融稳定性得到更好的评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更进一步，需要扩充数据覆盖面以使全球银行业发展得到合理估计，这包括回答跨境贷款是否确实正在普遍减少、市场新宠是否正在顶替撤退者的空缺等问题。目前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只将一小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计入债权国，这样就忽略了一些可能正在增长的借贷行为，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借贷和这些国家放给国际清算银行系统中国家的贷款。

- 其次，随着全球银行业变得更加本区域化，国际协调可能在一方面变得更加容易。欧洲银行业的联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揭示了在所有层面——市场进入、法律监管、监督和审议——的更好的区域协调的可能性。

同时，区域化也许使得最好的银行业技术和专业知识无法在每个市场都得到应用。更进一步，由于多样化程度会更有限并且一些新兴市场银行可能资本化程度更低，区域化也可能使得全球银行系统更容易受到冲击。更多区域基础上的金融监管监督也可能导致导向金融压制、垄断和分裂的政策行动，这可能对风险分

散和资源分配效率有不利影响。正因如此，增加对于不管是银行系统区域化（和很可能相关的分裂化）的驱动因素，还是更多对于区域化利弊的理解，都是当务之急。

本文原题为“Global banking: Fragmenting or going through structural changes?”。本文作者 Stijn Claessens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助理主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金融政策系教授， Neeltje van Horen 为荷兰中央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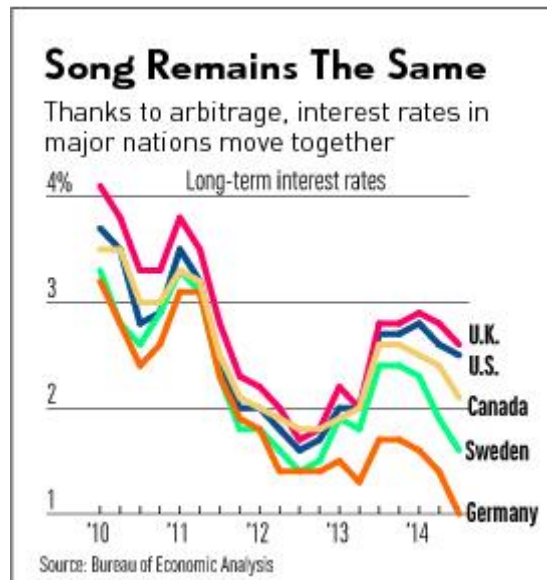
全球长期利率同步的奥秘

Alan Reynolds/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长期利率趋势相同，数值也是较低的？本文通过分析市场竞争与全球经济结构，结合美国利率的长期变化回答了这个问题。编译如下：

最近的经济学家杂志显示，各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数值非常近似：美国 2.24%，意大利 2.16%，英国 2.19%，新加坡 2.28%，以色列 2.15%，西班牙 1.98%，挪威 2.03%，加拿大 1.94%。这些利率不仅静态相似，而且动态变化也是趋同的。图 1 展示了 5 个国家的 10 年期国债利率（季度利率）变化。虽然它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货币表示，且汇率自由浮动，但是它们变化趋势非常相似。

图 1 不同国家之间 10 年期国债利率变化



如果我们考察国家间利率的差别，那么结论是：**如果如下条件成立——货币坚挺、低通货膨胀、违约可能性低，那么国家间长期利率总是趋同的。**这也许是由于各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造成的。投机商热衷于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减小了国家间利率差。

如果我们考察利率的总体变动，那么结论是：每个国家内部独特的政策与预期不可能造成长期利率的波动。同样，美国联邦利率也不应该是造成利率波动的因素，因为 08 年 12 月之后联邦利率几乎未变。

最近的报告指出，目前的低利率是美国 QE 造成的结果。但这不是真相。

其一，美国与英国经历了别的国家没有经历的 QE，似乎这意味着这两国的利率应该更低，但是实际上它们更高。况且，美国已经退出 QE，反而其利率高于继续 QE 的英国。

其二，报告弄错了时序因素。事实是：QE 开始时，美国利率上升；结束时下降。更具体地，2010 年 4 月至 2010 年 10 月间，美国 10 年国债利率从 3.85% 下跌到 2.54%，那可是美国结束第一次 QE 的时间段。

于是，QE 不能解释各国利率为何如此趋同。同样，财政赤字与财政盈余也不可以。俄国一直有很高的财政盈余，但是国债利率高达 10.2%，同时日本则完全相反，债台高筑，利率却最低。

部分原因是：经济弱国真实利率很低，因为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投资回报率就很低。这可以通过 GDP 增速来看，法国和日本增速疲软，它们的真实利率也很低。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却是反例。它们增长迅速，并且利率较低。货币贬值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和埃及经历着高的通货膨胀，其中巴西与俄罗斯尽管经济停滞，却有很高的利率。以上事实让投资者有些头疼，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经济学家说的话：“低利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更糟糕的是，在世界经济体中，单独国家降低利率是无法刺激本国经济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谁能够一家独大。任何一个中央银行的决策失误，至于能导致多严重的结果，取决于世界金融市场。尽管美联储影响很大，但它也不能主导世界。比如，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而别的央行没有反应，结果就是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美国国内需求下降，通胀得到了延缓。但是长期中这不可持续，因为别的国家的利率总是低的。投机者会试图减少利率的差异。

综上，全球利率低迷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速缓慢，通胀不强。这对美国是好事，因为这降低了能源与工业品的价格，保证了美国的消费和金融市场借贷能力。

本文原题为“Double Win for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Bali”。本文作者 Alan Reynolds 为 Cato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 6 日刊于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融资能刺激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吗？

Karthik Krishnan, Debarshi Nandy 和 Manju Puri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验证了银行融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文章使用州际分支银行放松管制这一外生变量来避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然后，文章利用中小企业管理局为未达到某一特定规模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一事实来区分哪些企业有融资约束，哪些企业没有融资约束。最终文章证实了融资渠道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具有融资约束的企业。银行管制的放松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编译如下：

对于企业来讲，能够获得足够的融资非常重要，尤其是刚成立的企业和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缓解他们的融资约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证实了银行融资的重要作用。

由于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银行融资对公司生产效率的影响。银行融资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正相关也许意味着高效率的企业寻求更多的银行融资，或许日益增加的银行融资渠道扩大了生产效率。但也有可能意味着，未观察到的因素同时影响着融资渠道和生产效率。

我们利用州际分支银行放松管制这一外生变量来避免反向因果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允许州际银行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这大大有利于企业获取银行融资。与之前文献研究相一致，我们的结论是银行是否放松管制关键取决于这增加的便宜的融资渠道是被企业用来从事无效率的项目还是用来从事有生产效率的项目。

我们利用1976-2005年美国中小企业和大型制造业公司的数据，研究了银行放松管制地区的企业是否提高了生产效率。我们证实：随着州际分支银行管制的放松以及1994年州际银行和分支银行效率法（IBBEA）的实施，非国有分支银行数量增加。这支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在管制放松的州，IBBEA会导致银行融资渠道的增加。

我们也证实了这些地区企业的生产效率会提升。经过一系列的检验，这一结果是稳健的。然后我们研究了融资渠道的增加如何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我们利用中小企业管理局为未达到某一特定规模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一事实来区分哪些企业有融资约束，哪些企业没有融资约束。对于制造业，这一特定的规模是由先前的就业水平决定的。如果某一公司的就业水平刚刚超过中小企业管理局规定的门槛，那么该企业就不能获得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融资支持。但略微低于中小企业管理局规定的门槛的企业，就能获得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融资支持。也就是说，刚刚超过中小企业管理局规定门槛的企业具有更多的

融资约束。如果银行融资管制放松，那么刚刚超过中小企业管理规定门槛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要大于略微低于中小企业管理规定的门槛的企业。

我们实证的结果与预期一致。在银行管制放松后，不能获得中小企业管理规定融资支持的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得更多。这也支持了这个观点：融资约束多的企业更能从银行管制放松中受益。我们也采用了替代变量来检验州际分支银行放松管制和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之间的关系是否受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与之前的分析相一致。

最后，我们检验了公司规模的影响。发现：对于小规模企业，州际分支银行管制放松与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稳健。这充分证实了银行管制放松后，融资约束越多的企业受益越大。为了更深一层地证实企业融资约束与我们结果的相关性，我们又使用行业层面的数据基于企业现金流测算的方法，验证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发现：更依赖于外在融资的行业在银行管制放松后，比不依赖于外在融资的行业，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得更多。

我们的研究结果最终证实融资渠道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具有融资约束的企业。银行管制的放松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生产率的提高。

本文原题为“Does Financing Spur Small Business Productivity?”。本文作者 *Karthik Krishnan* 为东北大学商学院教授，*Debarshi Nandy* 为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务学院教授，*Manju Puri* 是杜克大学商学院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国的金融“小多边主义”

Wang Hongying/文 杨国梁/编译

导读:作为转向更积极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加快了在“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参与。当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国内达成一致时,小多边主义能在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外解决问题。本文探讨了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小多边主义外交。虽然中国已经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历史已经超过 15 年,但近期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应急储备安排协议(CRA)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小多边主义举措更多的是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中国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小多边主义计划会暗中破坏传统的多边机构吗?本文认为,中国政府旨在利用金融小多边主义刺激全球金融机构改革,为该地区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同胞提供金融公共产品并直接推动中国的经济政治权益。中国的小多边主义并不是推翻现有的多边机构,西方国家应该了解、适应和鼓励中国的小多边主义开放。编译如下:

1、介绍

小多边主义是指多边机构无法在其成员国间达成一致时,在小的国家聚集组内或多边机构以外将问题解决。它在近年的经济外交中有着显著地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金融小多边主义不是全新的,它包括各种次全球金融合作计划,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它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也并非新产物,但过去一年中国参与金融小多边主义的速度在加快。一些人欢迎这种策略,但其他人则认为它破坏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政府的目的是刺激全球多边主义机构改革,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同时直接提高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中国领导层并不寻求推翻现有的多边框架,但如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总是被迫到现有多边体系外去满足需求,那它们的行动可能会削弱全球金融治理的多边机构。

2、重整多边金融机构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常批评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西方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他们要求多边金融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话语权。而西方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适应这种需求,但是 G20 和 IMF 并没有使得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效。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多边金融机构缓慢的改革步伐感到失望。一方面,中国官员继续呼吁这些机构拥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创建替代机构对这些机构施压。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创建 CRA,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其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一个平台。

除了在区域和金砖国家金融的积极作用外,中国作为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员也能提高在国际金融事务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没有给出全球金融治理框架

的详细蓝图，只是认为它会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更多的权重，并将有助于重新平衡南北政治影响力。

3、提供“公共物品”

中国参与金融小多边主义的目的之一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在区域水平上，CMI/CMIM, ABMI 和 AIIB 都旨在保障金融安全，鼓励经济共同发展。其中 ABMI 寻求发展区域债券市场以更好地利用该地区自身财力，减少对西方债券市场的依赖和相关的汇率风险。由中国发起的 AIIB 是为了填补区域基础设施融资中的明显不足。与 AIIB 类似，NDB 为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的替代来源，中国还强调 NDB 将有助于推动使用当地货币在新兴经济体中的贸易结算和投资。而 CRA 可以在金砖国家处于流动性危机时提供一个额外的金融安全网。

4、促进中国的利益及影响

除了对全球金融机构改革施压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外，另一个小多边主义金融合作的目的就是更直接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

2013 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丝绸之路”：向西经中亚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向南横跨印度洋至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政府寻求建立的网络，并通过这些路径扩大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而随着中国在 NDB 和 AIIB 发挥主导作用，这将推动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经济利益。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无法通过内需解决，需要在海外市场上寻找渠道。NDB 和 AIIB 还可以成为中国短期和长期中的货币政策。

中国参与小多边主义金融合作除了扩大经济利益外，也获得了潜在的政治利益。实际上，与政治利益相比，经济利益都是次要的。因为在促进海外经济利益上，中国自己的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 NDB 和 AIIB 没什么不同，而且中国的这两个银行的发展规模和外汇储备都已经很庞大了。中国与这些金融机构的活动应被理解为改善中国的全球形象和政治影响力的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5、中国的小多边主义和多边金融机构

中国最近的金融小多边主义已产生了不同的回应。虽然世界银行和 IMF 形式上赞同 NDB 和 CRA，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原则上欢迎 AIIB，但是对于这些新机构通过替代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而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存在疑虑。

中国金融小多边主义是否会威胁现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在认购资本上，CMIM 和 CRA 以及 AIIB 和 NDB 无法与 IMF 和世界银行相比。传统多边金融机构能比新的小多边主义机构更容易、更便宜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此外，这些新的机构还相当依赖传统多边机构的规则和程序。所以，中国的金融小

多边主义目前尚未对现有多边金融治理结构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改变，如果中国经济和金融资源继续良好成长，围绕中国的小多边主义金融机构可能更强和更具影响力，但他们对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愿的反应。

一方面，IMF、世界银行和G20正在尽量使相关计划涉及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政府也一再声称它欢迎和支持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主要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IMF投票权的重新分配在近期可能不会发生。中国希望通过小多边主义安排来行使财务领导力也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反。如果美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相互猜疑继续深化，将破坏全球多边合作。

6、结论

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其外交政策战略正逐步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在改革现有多边机构的障碍面前，中国正在聚集部分志同道合的国家并发展第二条路径，以增加它（和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本文的重点是金融领域的小多边主义，但也适用于其他问题领域。

为了确保中国的外交政策新动向有利于而不是破坏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国际社会应尽量满足中国的改革派议程并鼓励中国保持小多边主义的开放形式。中国和美国都声称，他们的TPP和AIIB等小多边主义项目是开放给其他国家和新成员的。但重要的是把这一说辞变成现实。

本文原题为“From ‘Taoguang Yanghui’ to ‘Yousuo Zuowei’: China’s Engagement in Financial Minilateralism”。本文作者 Wang Hongying 为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的特点

Sean Miner/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中澳自贸协定涉及领域广泛，其达成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这是澳大利亚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重大成功，同时确定了澳大利亚在预计达成的 TPP 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而言，这是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但是，与 TPP 所力求实现的贸易自由化程度相比，中澳自贸协定仍任重而道远。编译如下：

历经近 10 载，中澳自贸协定最终于 2014 年 12 月基本达成。澳大利亚首相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在致辞中提到“这是中国至今为止达成的最广泛的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必将开创新的时代。本文作者曾分析过中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将其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比较。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自贸协定是今年继签订日-澳和韩-澳自贸协定之后的又一次贸易政策方面的成功，并确立了澳大利亚在预计明年达成的 TPP 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其在许多之前决不让步的领域做出了妥协，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并承诺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

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历时这么久，主要是因为早在 2005 年谈判启动时，澳大利亚就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貌似犯了一个错误，澳大利亚由此丧失了一张谈判的关键底牌。中国一直拒绝开放农业和服务业市场。在中澳自贸协定达成之前，只有规模相对较小的新西兰的农产品能够自由出口中国。虽然历经艰辛，中澳自贸协定的达成最终也取得了诸多进步：

1、关税

目前，中国对某些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征收高达约 40% 的关税，但是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四年之后，93% 的进口关税将会被完全取消。对澳大利亚尤其重要的是，其对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出口额占其对中国总出口总额（900 亿美元）的比重超过 70%，这部分的关税也将被取消。并且，大部分澳大利亚制造产品的出口关税也将取消。中国这一关税自由化的程度与其对欧盟和智利所实施的关税自由化程度相当。

2、农业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实施 5 年以来，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额翻了两倍，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关税的削减。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很有可能实现类似规模的扩张。预计 9 年内，中国会对来自澳大利亚的许多奶制品免除关税，并废除保障措施（奶粉除外）。尽管在牛肉进口方面仍继续实施保障措施，但是中国将在 8-9 年内对澳大利亚牛肉和羔羊肉的进口逐步免除关税。4 年之后，日益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产的红酒也将免除关税，随后大部

分水果和所有蔬菜也将实现零关税进口。这将使得澳大利亚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生产大国（如美国）享有极为有利的地位。

3、服务

在中国对外签订的一系列自贸协定中，其与智利（2006年）和哥斯达黎加（2011年）签订的自贸协定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承诺所涉及的范围最广泛，这基于中国对于世界贸易总协定的承诺。尽管如此，目前明显的自由化变得难以捉摸了。但是，中澳自贸协定取得了进步：例如，在金融服务方面，澳大利亚银行在1年（而不是3年）之后就可以参与中国当地银行业务，并取消对最初两年内的盈利要求。但是，澳方银行将只能够经营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存款业务，不能够向中国当地个人提供贷款。保险公司将马上能够向中国公民提供汽车保险服务，考虑到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这将为澳大利亚保险业带来不菲的利益。

澳大利亚企业将享有特权，可以进军中国蓬勃繁荣的健康卫生服务领域，可以建立外国独资医院，也可以建立老年人护理中心。法律公司能够与中国法律企业在中国自贸区共同成立商业协会，从而为中国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上海自贸区还允许澳籍企业投资特定的具有附加价值的电信服务，与中资企业合资从事网络数据处理服务，从而也为澳大利亚信息通讯产业创造诸多发展机遇。

4、投资

中国所作出的重要让步之一是，其所有国有企业在向澳大利亚进行投资之前，必须接受澳方关于国民安全方面的审核，尽管其在私人企业进入澳方的强制性审查要求方面得到了缓和。中澳在世界银行国际投资者纠纷解决中心所指定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之前澳大利亚一直持反对态度。

5、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让步

因为澳大利亚原本属于完全开放型市场国家，中国出口商从中澳自贸协定所获取的利益相对较小。谈判达成之后，澳大利亚将逐步废除所有仍在实施的农产品进口壁垒，同时完全免除从中国进口的所有电子产品的关税。

6、底线

在服务贸易壁垒方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OECD关于服务贸易限制的最新指数显示，中国在18种服务项目中的14个服务项目的贸易限制程度均位居前5位。中国对贸易的严格限制涉及到诸如商业银行、建筑业、销售业、保险业、物流业、运输服务和电信等领域。OECD的统计数据与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是一致的。中国对商品贸易实施的非关税壁垒也仍然存在。虽然中国对商品贸易关税的削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仍通过要求进口产品

提供卫生和健康证明来限制某些产业的贸易，或者通过强制实施其他规制措施来抑制某些产品的进口。此外，中澳自贸协定最终并未谈及知识产权保护、出口税收、政府采购等问题。尽管与中国之前签订的自贸协定相比较，中澳自贸协定的确有所进步，但是与 TPP 力求实现的自由化程度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原题为“*At Long Last, A China-Australia FTA*”。本文作者 Sean Miner 为 PIIE 中国研究项目经理和研究助理。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构想

Christopher K. Johnson/文 刘洁/编译

导读：2014年11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演讲，提出建立一个全面的外交政策平台。本文就这次讲话中所提到的中国外交政策构想作了逐一分析，首先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几个关键的外交政策学说进行重申和认可。其次他重申中国未来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并把中共外交政策中的概念与自己的概念（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联系起来。再次，他将经济外交视作总体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最后，他还改变了中美外交态度。编译如下：

11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演讲，这次会议是习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外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习的六位政治局常委同事，以及数百名来自中国各省、军队、国企和国家机关单位的官员。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是极为罕见的，并且同样具有权威性。例如，从公开可得的信息来看，在中国上一届领导人胡锦涛执政期间只举行过一届类似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习执政的有限时间内，他竟然在上任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选择构建其外交政策的初步轮廓。而胡锦涛在2006年才主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距离其上任的时长将近是习目前的两倍。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建立一个全面的外交政策平台。这表明，尽管他和他的同事们正面临着众多国内挑战，但一种积极的、平衡的、且必要时需要强硬的外交政策或许会成为习执政的标签。

第一，习近平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几个关键的外交政策学说的审查和认可。中国的邻国和美国应当至少从习对这些重要概念的肯定当中得到一些安慰。例如，他指出，中国将继续遵循“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可以理解为，北京的邻居和其他主要伙伴国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中国的崛起只会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只会追求“双赢”的结果。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外交词汇中的核心已存在超过十年。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巨额国防预算逐年增加以及领土主张方面的坦率直言，我们很容易忽视和平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对失控的军事建设能够起到刹车的作用。隐含的重点是经济发展这一概念——而不是苏联搞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冒险主义的路径——是确保一国找回其区域优势的重中之重。

然而更重要的是，习在讲话中重申，中国将至少在2020年之前一直处于战略机遇期（*POS*O），这大约等同于习的执政期。这一概念反映了共产党的主要外部战略方针，同时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现状的判断，即中国正处于一个良性的外部安全环境中，这允许它专注于其内部发展。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

体制，这一点在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和重新确认（2002年第16次，2007年第17次和2012年第18次会议），并经常在官方演讲和正式文件中被引用（比如中国国防白皮书）。习近平多次告诫中国军方，应提高战斗力，为“战斗并赢得战争”作准备。在其领导下的中国高级官员还给出了更直接的评论，他们认为美国的再平衡并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利益，这给领导人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评价蒙上了一层阴影，并且反映出一种观点，即中国发生周边冲突的可能性要高于中共此前的判断。习近平在讲话中似乎回避了这一点，他鼓励国家官员在国际体制中“不应让我们的观点被错综复杂的发展所牵绊”，而应重点保持战略机遇期。

此外，隐含在习近平关于战略机遇期概念背后的一个明确观点是，中国不会公然寻求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破坏力量。只要这一概念仍然有效，对中国来说，这将限制其建立一个旨在从根本上重塑东亚地区权力平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意愿和能力。作为一个优秀的辩证主义思想家，历史上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在遵守他们依据理论性评估和预言而为自己设定的参数。因此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也不例外。因此，权威性地承认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良性，就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必须确保中国军备力量更公开且更有力，因为未来中国利益难免会受到威胁。

然而，如果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只不过是新瓶旧酒就不对了。寻求中国的和平崛起显然是习近平引用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概念的一大重要动机，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同样重要的是习近平对于国内政治的测算。虽然不可否认习近平在其任期内提出这些为时尚早，但他能在理论层面阐述其政策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屈指可数的。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将自己的演讲基于理论，就能够直接把中共外交政策中的概念（如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与自己的概念（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联系起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去年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讲话体现“中央党校领导的最新外交理论创造性的成就。”习近平通过将其提出的重要举措包裹上理论的外衣，有助于提高这些举措在中国体制内的权威性，并同时有助于巩固其个人的领导地位。此外，阐述习近平作为党的路线的概念，而不阐述简单的政策措施，还有助于通过提高批评者的挑战成本而使习免受攻击。

作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助手，习近平很清楚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过习的讲话中似乎透露出将中国更快地从邓小平提出的在国际上应保持低调的长期禁令中挣脱出来。讲话中的几点评论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例如，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机遇在于中国的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进一步发展。他还

提到，“中国应该开发一种独特的外交策略以匹配其大国角色”。这实际上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应当开始发挥其作用。当我们回想几年前的事情时就知道这一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了，在 2010 年，当时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写了冗长激昂的文章捍卫邓小平的观点，并警告中国共产党发展得太远太快是错误的，会给中国带来潜在风险。而习近平的讲话似乎明显反对这一观点。

事实上，习近平的讲话中似乎也在微妙地改变战略机遇期的定义，更加强调中国的行动主义。而在原始的概念框架中，中国应谦卑地接受有利的外部环境并视作珍宝。如果想取得持续性发展，习近平的构想似乎更具前瞻性，中国可以通过其不断提高的实力来构建战略机遇期的轮廓。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认中国的内外政策间存在相互依赖性，但是，他再一次选择将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不同于以往认为中国能够从周边环境中得到收益是幸运的，习近平似乎认为中国国内发展有助于提升海外稳定和安全。隐含在这种描述背后的是对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可持续性的巨大信心。这种构想也与“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对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的预测高度一致，暗示习近平认为这次讲话是他构建中国未来设想中的下一个逻辑衔接。

在实施层面，两大主题贯穿在习近平的讲话中。第一个明确的重点是建立更集中、更熟练的区域性外交。习近平重复引用他自己的观点，即北京在与邻国交往过程中需要采用“双赢”策略。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并将其添加到国家的外交工具中以达成上述目标，比如系统性地发展中国软实力。习近平倡导的更好的区域性外交非常符合他在去年 10 月份主持的工作会议上关于周边外交的主题，但在 CFAWC 重申这一点可见其权威性。

如上所述，习近平将经济外交视作他的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他在上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相关地区峰会上的表现明显突出了这个重点。例如，习近平在 APEC 会议上宣扬亚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用以替代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暗示中国认为在亚洲的经济是安全的。习近平承诺的资助中国“新丝绸之路”的 400 亿美元计划也给众多旁观者来了个措手不及，这证明习愿意把他的钱放在他说过的地方。习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暗示中国的邻国，区域性经济的健康状况与中国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密切相关，这也说明习近平较其前任领导人更愿采用多元化外交政策。

事实上，习近平讲话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与美国关系的观点上似乎存在冲突。习并未直接提及中美关系，只有一两句提到应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关系。习关于世界必然向多极化演进的论述也暗中抨击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声望。然而这并不是说，习近平是在疏远与华盛顿的关系。习近平在与奥巴马

的第二次峰会中明确表示，他将继续把美中关系看作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可能意味着习近平不太可能像前任领导人那样因为热切渴望与华盛顿构建良好关系，而以其他重要关系的建立为代价。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应该作为奥巴马政府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内构建并改进其对中国的总体政策战略的一个重要考量。

本文原题为“Thoughts from the Chairman: Xi Jinping Unveils his Foreign Policy Vision”，作者 Christopher K. Johnson 为 CSIS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利马气候会议的进展与挑战

Shane Tomlinson /文 杨原/编译

导读：2014年联合国利马气候大会于12月1日至12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此次会议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准备会议，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hane Tomlinson认为，此次会议制定了达成2015年巴黎会议全球性气候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所承诺采取的行动依然缺乏透明性，全球性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然面临挑战。编译如下：

在最后一轮马拉松式的讨论之后，利马气候大会的参会者们终于为计划于2015年下半年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出台的全球性协议设置好了通道。但是，一些重要的问题此次仍然未能解决，特别是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承诺采取的行动依然缺乏透明性，这将有可能影响到最终解决方案的正当性。

“利马呼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包括了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商定了2015年各国将如何推进各自所提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即联合国所说的“国家自定贡献预案”）；其二是第一项内容的附加内容，即为巴黎会议谈判所能达成的任何协议的最终细节提供了依据。达成一项路线图并为来年设定好起点是此次利马会议的核心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取得了成功。

然而，此次利马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中缺失的内容与其已包括的内容同样重要，其中最关键的一项缺失就是“国家自定贡献”的透明度。如果各国各自所承诺采取的行动缺乏透明性，就很难对各个国家实际所做贡献的大小做出比较，同时也无法知道这些举措是如何共同组合在一起的。一些国家曾努力试图让最终的协议做出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各国必须提供有关本国所承诺采取的行动的相关重要信息，包括参考标准、时间期限、覆盖范围、前提条件、实施方法等。但是最终定稿的协议却将这一要求改成了非强制性的，这就为某些应对气候变化志向不坚定的国家糊弄应付提供了可能。

尽管会议达成协议要求联合国就各国所承诺采取的行动的总体效果做出正式的评估，但各国行动透明度的缺乏将有可能影响该评估的准确性。如果不能提供基本的信息，将很难衡量各国举措的科学性，从而也将难以对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做出准确的把握。在此情况下，诸如高校、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这样的第三方机构就有责任展开相应的调查和研究，以弥补上述信息上的不足。

利马会议注定将成为前进的铺路石而不是终点。此次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的时间内，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举措接连出台，包括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欧盟2030年气候目标、绿色气候基金100亿美元捐资承诺等。这些举措所形成的声

势，很好地塑造了此次会议谈判的基调。尽管共识并没有很容易的达成，但是为 2015 年会议的成功所做努力的过程的确要比此前所预期的更为乐观。

此次会议的分歧主要围绕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还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这个老问题，这种主张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差异。另一个问题是对那些气候变化受害国进行补偿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大力推动下，这两个问题被写入了此次会议最后的文件中。如何解决各国在“区别责任”问题上的分歧，将会是来年各国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挑战。

此次利马会议还展示了外交和国内压力是如何改变一国立场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 2014 年 11 月澳大利亚担任 G20 峰会主办国期间曾强硬反对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然而，来自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迫使澳大利亚政府改变了政策，同意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 2 亿澳元。除此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捐资，以促进南南合作，例如秘鲁和哥伦比亚就各捐资了 600 万美元。

此次会议的主办国秘鲁在促成最终结果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秘鲁环境部长、此次利马气候会议主席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Manuel Pulgar-Vidal）的领导能力获得了广泛的赞誉。2014 年 11 月，普尔加-维达尔在查塔姆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利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制定气候议程、推动变革行动的地方”。此次利马会议的成果，包括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等，为 2015 年的巴黎会议提供了谈判的基础，这些成果也使得普尔加-维达尔的希望正在成为可能。

美国、中国和印度在此次利马会议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参加会议时重申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的承诺。很明显，在 2015 年巴黎会议上达成协议正越来越被视为奥巴马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中国和印度同样也是各轮重要谈判中的中心角色，尤其是在那些有关“区别责任”问题的谈判中。与此相对的是，欧盟在此次会议中则显得相对比较沉默。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欧洲对于 2015 年的谈判将非常重要。

总之，达成变革性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各种障碍也同样存在。为了达成一份这样的协议，各国还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本文原题为“Lima Climate Deal Marks Progress, but Challenges Remain”。本文作者肖恩·汤姆林森（Shane Tomlinson）是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研究领域是能源、气候与资源治理问题。本文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刊于 CHATHAM HOUS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一场远未结束的战争

Doug Bandow/文 杜哲元/编译

导读：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历时漫长，尽管这些年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但它们却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美国的安全并不依赖于中亚地带的稳定，而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其军事存在亦无益于稳定的实现。综合诸多因素，作者认为美国应当放弃在阿富汗实施强制性稳定策略。编译如下：

美国介入阿富汗战争已长达 13 年之久，这个时间是美国南北战争、美西战争、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的持续时间的总和。而美国保留在阿富汗的一万人的驻军也只能维持目前的糟糕现状。

在 9.11 事件之后布什总统立即发动了对塔利班的反击战争，美国通过此举也在向世界宣告——如果哪国政府试图利用恐怖势力袭击美国，它就必须下台。但不久之后，布什政府偏离了它的主要反恐战略，即不再以反恐为契机来实现阿富汗的重建，而是以反恐为借口对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发动政权更迭战争。

尽管这些年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但它们却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阿富汗政府以其腐败、低效和无能而著称于世，阿富汗政府军的战斗力也是参差不齐。西方大量现金的流入只是在为阿富汗上层精英创造财富，而未能实现其国内经济的真正繁荣。尽管有国际社会的高度期待和强大的外在压力，阿富汗也难保今年的总统选举能够公平、自由地进行。另外，只要阿富汗政府继续依赖外国力量的援助，它的国家主权就将继续受到损害，而其国内的政治和解与团结更是遥遥无期。

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其军事存在亦无益于稳定的实现，即使这一存在的规模到 2016 年减少一半，并到 2017 年底减至一个正常的外交代表团的规模。在这几十年间，为了改造阿富汗，美国投入了数以万计的部队、上千条生命、数百亿美元以及几十个高规格的外交使团，但这一切却不能抑制在阿富汗的各种悲剧的发生。由此来看，美国未来在阿富汗保留如此小规模部队一方面不足以协助阿富汗政府抵御塔利班，而另一方面如果从不介入的角度来看，这个数量又太多了。

阿富汗人民将最终决定他们将以何种方式生活，但其结果并不一定会支持强大的中央集权——特别是基于自由民主的西方观念。然而，只要阿富汗不再支持那些致力于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其政局将出现何种变化对美国而言并不重要。另外，美国介入阿富汗也使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的冲突日趋频繁，而如果美国能从该地区全身而退，这种冲突也将随之减少。

美国的安全并不依赖于“大中亚”地带的稳定，无疑义地，华盛顿渴望在阿富汗保留情报机构的存在。但是，在“双边安全协定”之下驻留上千名军事人员，并

规定在“双方都同意”的条件下这些人员可以参加战斗却是没有必要的。美国固然期望对塔利班取得先发制人的胜利，但军事打击并非是实现胜利的唯一方式。塔利班的残暴和混乱统治将会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而外国干涉势力的退出亦将使塔利班关于“自治”的宣传口号失效。

美国应当放弃在阿富汗实施强制性稳定策略——在伊拉克、在也门、在索马里、在利比亚以及在伊拉克，一个事实被反复验证，即以轰炸、入侵和占领等方式很难给一国带来稳定，相反，这种干涉和介入将滋生出诸多形式的混乱。

本文原题为“A War that Never Ends”。本文作者道哥·班多(Doug Bandow) 为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最早发表在 2014 年 10 月 3 日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在线”，[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利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Jim Balsillie成立于2001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